

宋代的隐士与文学

刘文刚 著



宋代的隐士与文学

刘文刚 著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1992年·成都

(川) 新登字014号

责任编辑: 陈克坚

封面设计: 刘文刚

技术设计: 石大明

宋代的隐士与文学

刘文刚 著

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市望江路29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mm 32开本

7.75印张

210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

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3000册

ISBN 7-5614-0630-4/I·86

定价: 5.00元

自序

当我们站在陡峭的山崖面前,观看面前的大山,我们很难看清这座山的面目。如果拉开一段距离,比如说几百米,或者上千米,这座大山便历历在目。如果我们不正对着这座山,而选取一个侧面来观看,我们所看到的便与正面不同,或者说更多些。研究工作也是如此,很多正面研究解决不了的问题,从侧面研究往往会有新的突破,甚至使问题迎刃而解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,这本小书就从隐逸的角度来研究文学。反过来说,它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隐逸。

隐逸在中国产生极早,几乎可以说与中国的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同步。传说尧时已有名隐巢父和许由,这自然不一定可信。因为尧是怎样一个人,我们本不甚了了,那时是否有隐士,当然更不得而知。但是,夏代有隐士,却基本可以肯定。《庄子》记载汤伐夏桀,谋于卞随,卞随投水而死,桀又让务光,务光也自沉于水^{〔1〕}。二人都~~是隐士~~。这个记载固然也不一定可靠,但夏商之交的伊尹却~~是~~称最早的名~~隐士~~ (根据~~后世~~一般的看法是假隐士)。《史记》记载:伊尹处士,汤使人~~召之~~,五反然后肯从汤。而《史记》另一记载说伊尹“乃~~是~~莘氏媵臣”^{〔2〕}。不管哪种说法,都说明伊尹是隐士。伊尹是商代的开国功臣和权相,而早年身分和地位很低,说明他确实是在隐。事实上古代很多人就把伊尹看作隐士。因此,夏代有隐士,是无可怀疑的。

打从夏代产生隐逸后,隐逸这种社会现象一直在中国持续不断,长达四千年之久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隐逸才宣

告止息。隐逸是古代很多国家都有的,中国的隐逸所以特别引人注目,原因之一是它很早就很昌盛。远在周代,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,隐逸差不多已经蔚成风气。自此隐风一直吹拂中国大地,与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生密切的关系。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的隐逸,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社会。

宋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,记得严复说过,近代中国的面目十之八九是宋人造就的,这个说法尽管太夸张,而他指出宋代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,却是很有道理的。宋代承前启后的作用特别明显。宋代的隐逸是对前代隐逸的继承,也是对前代隐逸的发展;宋代文学是对前代文学的继承,也是对前代文学的发展。所以这本书主要探讨宋代隐逸与文学的关系,总结宋代隐逸及隐逸文学的一些特点,进而阐述我自己关于中国隐逸及中国文学的新观点。

研究隐逸,首先面临着什么是隐士和隐逸的问题。什么是隐士,什么是隐逸呢?这两个词的含义往往因人而异,至今也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。大致说来,含义有宽窄两种。隐士窄的含义是隐居山林的人,隐士宽的含义是没有做官的士——包括弃仕的士,皆可称隐士。隐逸是比隐士更宽泛的一个概念,凡是不愿做官的行为——包括在家读书生活,落职闲居,休退,皆可称隐逸。本书正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隐士和隐逸这两个概念的。我之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古代很多文学作品都是根据这样的隐逸概念写成的,如果任意改变这样的概念,势必把一部分文学作品排斥在隐逸之外,不利于问题的研究。然而在具体评论某人是隐士的时候,我则比较审慎,同样,这也是为了有利于问题的研究。

说到这里,顺便说一下,本书的准确书名应该是《宋代的隐

逸与文学》，只是为了通俗易懂，才定名为《宋代的隐士与文学》。如上所述，隐逸是比隐士宽泛得多的概念，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。

隐逸是一个有趣的问题，提起大家都知道，但又缺乏深入研究。我们说大家知道，是因为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晓得中国有隐士。我们说缺乏深入研究，乃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并不多，而且没有应有的研究深度。仅有的一本专著是蒋星煜先生的《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》。就是这本专著，梁漱溟先生还说“惜蒋著对隐士缺乏了解”^[3]。足见这个研究状况是多么令人不满意。要在这种状况下研究隐逸与文学，自然感到格外棘手。然而正因为缺乏深入研究，也就更需要深入研究，研究起来也就更觉得有兴趣，更觉得有意义。因此我也就不揣浅陋，知难而进。筚路蓝缕，本书错误一定不少。我没有什么奢望，只愿这本小书是春天的一片叶蕾，如果能给隐逸的研究带来一点绿意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刘 文 刚

1990年5月

于四川大学

注释：

[1]《让王》。

[2]《史记》卷三《殷本纪》。

[3]《中国文化要义》第14章《结论》。

目 录

自序·····	(1)
隐是文苑中的长青树·····	(1)
文学展示的隐逸生活·····	(33)
隐士的心态与世界观·····	(65)
文学展示的隐士形象·····	(93)
在仕宦与隐逸的路上·····	(122)
两种截然不同的隐士·····	(150)
隐对文学境界的开拓·····	(175)
隐带给文学的力与美·····	(206)
后记·····	(240)

隐是文苑中的长青树

隐风盛炽的时代

隐逸从上古发源,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,到了宋代,又是一番新的景象。仿佛黄河流过三门峡,波澜壮阔,气势磅礴。人们都知道唐代是隐风很盛的时代,其实宋代隐风比唐代更盛,只不过人们很少注意,很少谈及罢了。翻开宋代的有关文献,只要稍一凝神,就会感到强大的隐风的吹拂。

隐逸是社会的产物,它与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。宋代社会非常适宜隐逸的生长,又建立于隐风很盛的唐五代之后,所以宋朝一建立,隐逸便蓬勃发展起来,其势如雨后春笋。

经历五代长期的战乱,人心思治。农业、手工业、交通、商业迅速发展起来,社会呈现新的繁荣气象。社会的安定,经济的发达,促进了文化教育的飞跃发展。特别是造纸和印刷术的先进,使书籍的印行盛况空前。不但国子监和地方政府大量刻印书籍,个人、祠堂、作坊、书院也普遍刻印书籍。书是士人的粮食,书籍的大量印行,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五代时期,书少,也贵,到宋代景德年间,国子监藏书达十余万板,

邢昺对真宗说：“臣少时业儒，观学徒能具经疏者，百无一二，盖传写不给。今板本大备，士庶家皆有之，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。”

^{〔1〕}民间私人藏书多达四万余卷，连寒素之儒，也动辄蓄书数千卷。书籍的大量印行和流通，为文化的普及和提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宋初兴建了大量书院，多数是那些留意教育的乡绅和士大夫修的。有的书院环境幽雅，气派宏大。处士胡仲尧在风景清丽的玄秀峰建的书堂，“筑室百区，聚书五千卷”，“列植松竹，间以葩华。涌泉清池，环流其间；虚亭菌阁，鼎峙其上”^{〔2〕}，是一个读书的好环境。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、石鼓书院、应天府书院、岳麓书院，合称“四大书院”。大型书院在校生徒多达千人以上。宋代政府也大肆兴建学校。景祐四年，“诏藩镇立学”。庆历四年，“诏诸路州军监，各令立学”^{〔3〕}。生徒二百名以上的，还许置县学。自此以后，州郡都建立了学校。学校的普遍建立和书籍的日益丰富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学的机会，大大扩大了教育面。原来受高级教育的，多是官吏、地主、富有的商人子弟，现在一些富裕的市民子弟和祖祖辈辈种田的富裕的农家子弟，也受到良好教育，成为士人。这样，士的员数空前增长，士的队伍空前壮大。

士本来是官的后备军，士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长大做官。然而士的员数猛烈增长，官的员数却很少增长，结果造成大量的士人没有机会出仕。他们闲散在社会上，以处士终老，形成了宠大的处士群体。这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。这庞大的处士群体，正是宋代隐风盛炽的根本因素，也是酿成隐风盛炽的主要社会基础。

用历史的眼光看，五代隐风很盛，使宋代先天就带些隐逸

之气。唐末五代风云变幻,干戈日寻,很多士人明哲保身,遁世逍遥。贯休、齐己以僧为隐;谭峭、林光庭以道为隐;刘洞、唐求栖于山林田园。很多官吏一边做官,一边也为自己和子孙作隐居之计。南唐毛休为御史,藏书数千卷,辟田数百顷,曾经对人说:“欲仕者可以识废兴,欲隐者可以实仓廩,吾于子孙计足矣。”^[4]像毛休这样的官吏又造就一些隐士后代。宋得到天下,也得到一大批隐士。五代隐士戚同文、陈抟等,入宋而成为著名的宋代高隐。戚同文长于“晋末丧乱,绝意禄仕,且思见混一,遂以‘同文’为名字”。他“筑室聚徒,请益者不远千里而至”^[5]。他的门人登第者五六十人,不少成为宋代的名臣。五代时期,一些隐士避乱躲进深山。宋建国后,他们纷纷出山建置庄园,成为地方上很有影响的乡绅。汪藻说:“当唐末五代干戈纷扰之时,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谷间,率皆即深而潜,依险而居。殆宋兴百年,无不安土乐生。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雄长其地,以力田课僮仆,以诗书训子弟。”^[6]他们使宋代的山林和田园,立国之初便弥漫着隐逸的气息。五代不但为宋代培养了一大批隐士,而且为宋代隐风的昌盛做了思想的准备。

宋初的君主待隐士都很优渥。樊知古向太祖举荐夏乾锡,太祖为征召他,特地为他制冠服。陈抟五代时隐名就很高,太平兴国中来朝,太宗待以殊礼,诏赐号希夷先生,仍赐紫衣一袭。留陈抟阙下,又增建陈抟居住的云台观,与陈抟以诗赋相和,留居几个月才还山^[7]。历史上很少有隐士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。陶弘景号称山中宰相,他所受的梁武帝的优宠也不过这样。真宗更喜欢隐士,待隐士很优厚,经常召见隐士,而且对隐逸生活很感兴趣,他叫人把种放和魏野的隐居绘成图画^[8]。皇帝的好尚对一个时代的风气有重要影响,特别是开国之君,对时代风

气的影响更大。宋初皇帝对隐士的优宠,是刺激宋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。

五代的隐逸遗风,宋代的众多处士,皇帝对隐士的青睐,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,在宋初便形成了强烈的隐风。隐风的强烈表现在两方面:一是士人喜欢遁迹山林,栖迟田园,隐士遍布四方。一是隐士中涌现出很多高隐。杨朴、潘阆、李洙、刘巽、敷永、田浩、李宁、宋濬、刘概等,名噪当世。其余如陈郢与弟弟陈奇并称“两高士”,高恂与张尧、许勃号“南山三友”,王子华与翟士端、郑隐、郑邀、罗隐之等号“五高士”。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四大名隐:陈抟、种放、魏野、林逋。他们的名声传遍天下,很多人对他们倾倒之至。在我国历史上,还没有同时出现过这样多名声如此大的隐士。秦汉之际的“商山四皓”,虽然也是四人,但他们原是一个团体,一伙人,和宋代四人单独隐居不同。汉代的严光和梁代的何点,虽然也名扬四海,但他们都是皇帝的故人,和皇帝有瓜葛,他们名声那样大,多少沾了点儿皇帝的光。宋代这四大名隐,纯粹是靠自己隐出名的。隐士的知名度和数量是衡量隐风是否昌盛的重要标准,宋代这两方面都很突出,说明宋代的隐居水平超越古人,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宋代特殊的社会状况,是隐逸之风昌盛的重要因素,北宋前期,经过长年的休养生息,社会呈现一派百业兴旺的太平景象。士人普遍怀抱理想和大志,然而在经历求仕失意的痛击之后,很多人便隐起来,过着琴书自娱,逍遥自在的生活。这些隐士自称“清世”隐士,我们可以称他们为“升平”隐士。魏野、林逋、邵雍可以作升平隐士的代表。邵雍《太平吟》写道:

天下太平日,人生安乐时。更逢花烂漫,争忍不开眉? [9]

这里所表达的是太平中,隐士称心如意的心情。

南宋偏安一隅，战乱频仍，又是产生隐士的良好土壤。南宋皇帝昏庸腐化，秦桧、贾似道一类奸臣当道，残害贤良，卖国求荣。朝廷乌烟瘴气，军队屡战屡败。本来只有半壁江山，还日丢月失。而金蒙贪得无厌，磨刀霍霍，随时准备过江牧马，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。一些有识的冲退之士，看到宋王朝不可救药，便遁迹山谷岩穴，避祸远害。张先是四川蓬州人，“南渡后，每取《徐孺子传》读而叹曰：‘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如徐孺子之制行，斯可也。’遂修身自得，足迹不入城市”^[10]。四川是大后方，士人尚且藏而不露，那么，江南士人的思想状况，更可想而知。叶茵写道：

时事艰难路险巇，得来名利亦何为？赵州茶罢急归去，莫待钟鸣漏尽时。^[11]

诗反映的正是当时士人普遍的心理。时局险恶，做官上不能救国安民，下不能享受荣华富贵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不愿在社会上流宕，匆匆归家，表现了乱世士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绪。有这种心绪，自保尚且不暇，那里还想去做什么官！

学术和隐逸，历来有着亲缘关系。宋代学术非常兴盛，可以和汉代、清代并驾齐驱。在时代浓厚的学术氛围中，一些士人对学术产生极大的兴趣，不愿做官，乐于过宁静的书斋生活。道学沸沸扬扬，为一代之学，影响更为深远。它吸引很多士人潜心研读和著述。罗从彦拜杨时为师，其时杨时退藏，罗从彦“筑室山中，绝意仕进。终日端坐，间谒时于溪上，吟咏而归，恒充然自得焉”^[12]。罗从彦的同乡李侗，又因为仰慕罗从彦，而从罗从彦学，“既而退居山田，谢绝世故余四十年，饮食或不充，而怡然自适”^[13]。像他们这样因喜爱学术而走上隐逸之路的人，在宋代为数不少。

弃官的官吏,也是隐士的重要来源。宋代很多官吏,因为不得志,四十岁上下便挂冠,还乡做起隐士来。王立之尝以假承奉郎监怀州酒税,寻易冀州佝官亦仅累月,请求回家养母,自此不出。他在都城附近有一座园林,“而笑傲自适如一日焉。命其园中之堂曰‘赋归’,亭曰‘顿有’,亦足以见其志云”。^[14]宇文之邵年未四十便致仕,“自强于学,不易其志,日与交友为经史琴酒之乐”^[15]。

激烈的党派斗争,也把一部分失利的官吏抛进隐居者的行列。宋代党派多,斗争残酷尖锐,此起彼伏。失败的一党,其重要角色或遭贬谪、流放、残杀,次要角色则自己请求还乡或被削职为民。郑侠反对王安石变法,官安上门监。熙宁七年,久旱不雨,绘流民图。王安石罢相,出知江宁,又绘《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》,指斥吕惠卿。吕惠卿奏为谤讪,编管英州。崇宁元年差监漳州衡岳庙,未被敕,为蔡京所挤,名列元祐党籍,追悔前命,勒停。五年复将仕郎,许叙用,而郑侠却不愿出仕。郑侠还乡,唯存一拂,自号一拂居士。性清俭,终身布衣粝食。他说:“无功于国,无德于民,若华衣美食,与盗贼何异?”^[16]晁用叔是苏轼党人,绍圣初,苏轼党人“离谗放逐”,晁用叔“于是飘然遗形,逝而去之。宅幽阜,荫茂林,栖于具茨之下,世之罗网不得而婴也”^[17],他隐居后便终身不出。史弥远禁道学,残酷打击道学家,一些道学家就用隐居的办法逃避灾难,“士之清修者,深入山林以避祸。而贪荣畏罪者,至易衣巾,携妓女于湖山都市之间以自别”^[18]。隐居成了政治斗争失利者的防空洞和福地。

宋代的寺庙和道观也涌现出一批隐士。僧道隐居,六朝时期已经有了。不过宋代隐居人数更多,隐士色彩更浓。僧道栖于山林,没有官职,本来就有几分象隐士,“地形各占幽深境,天

产俱为散逸才”^{〔19〕}，魏野的这两句诗，准确地概括了隐士与僧道的共同之处。宋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紧密，僧道带有更多的士的色彩。有些僧道着意跻身隐士的行列。不仅在生活上，就是在思想和行动上，也力求隐士化，这些僧道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隐士。陈抟是道士，《宋史》让他入《隐逸传》，历代的人也都认为他是真正的隐士。和尚智圆也是典型的隐士。智圆自称中庸子，他买杭州孤山夕阳之坡的玛瑙禅院为自己的隐居，经门人浩才主持重建，具有“楼台亭阁，泉石华竹”^{〔20〕}，与俗家隐士的隐居，并无二致。他的《贫居赋》这样表述他的生活和思想：

荒径草深兮衡门长扃，怀(坏)壁虫响兮幽砌苔青。饘粥糊口兮吟咏适情，行披百氏兮坐拥六经，穷困而通兮盘桓居贞。嗟乎薄徒兮附势尚声，奔走要路兮骑非衣轻，宴安华居兮狼心豕形。岂思止足兮安戒满盈，名随身没兮祸逐贫生。焉如忠士守仁义，簞食瓢饮不改其乐兮，垂万世之令名哉。^{〔21〕}

对薄徒的斥责和自己安贫乐道的表白，是十足的隐士思想，完全象出自一位俗家隐士之口。象陈抟、智圆这样的僧道，可以说是戴着黄冠，或穿着缁衣的隐士。宋代僧道人数甚多，“时有‘无路不逢僧’之语”^{〔22〕}。僧道既多，僧道中的隐士也很不少。杭州孤山有六人隐居，除林逋一人是俗家人外，其余五人都是和尚^{〔23〕}。和尚与一般隐士之比，竟是五比一。

宋朝灭亡的时候，又出现了一大批遗民，使宋代的隐逸最后放出了耀眼的光采。古代每逢一个朝代灭亡，就要出现一批不事新朝的遗民。宋朝的灭亡情况又有不同，不仅是改朝换代，而且是异族入主。强烈的民族的情绪与不事二姓的忠诚叠在一起，激起更多的士人奔上隐逸的道路。赵孟頫是宋朝宗室，元朝授给他吴江尹的官，他推说有病，固辞不就。去吴投靠亲友，

十年后成为道士，法号道渊，住在松江北道堂。五年后又做和尚，改名顺昌，自号“三教遗逸”。道士和尚都做，就是不做元朝的官。宋亡之后，谢枋得居闽中，元朝屡征不起。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强迫他北上大都，谢枋得临行前便抱定必死的决心。他作诗说：“此时要看英雄样，好汉应无儿女情。只愿诸贤扶世教，饿夫含笑死犹轻。”^[24]到达大都，谢枋得生病，拒绝吃药。丞相留梦炎叫医生把药和在饭里，让谢枋得吃。谢枋得大怒说：“吾欲死，汝乃欲生我耶！”^[25]投药于地，绝食而死。这样坚决不仕元的人，宋末还很多。

以上各路隐士，汇成浩浩荡荡的隐逸洪流。宋代隐逸阵容之庞大，声威之雄壮，远非前代可比。这洪流又影响社会的各方面，使一部分非隐士也像隐士一样生活，或以隐逸相标榜。

在强大的隐风中，一些闲官过着类似隐士的隐逸生活。宋代官僚制度特殊，专门设置一些闲官散职，如提举宫观、增判三京留司御史台、国子监员，“以优士大夫老疾不仕者”^[26]。优待老疾不任职者，不过是朝廷最初的意愿。实际上当这些闲官的，大半不是年老有病的。李建中“尤爱洛中风土”，前后三次请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。他在洛阳，筑园号“静君”，喜欢游山玩水，题咏自称“岩夫民伯”^[27]，俨然以隐士自居。奉祠是宋代最流行最时髦的闲职。所谓奉祠，就是管理道教的宫观。宫观本没有什么可管理，不过是一种无事可干的虚职。奉祠很自由，可以居住在家里。官吏稍不如意，辄向朝廷“请祠”。廷对官吏不感冒，也用这种“祠禄”对付他们。奉祠在宋代完全是家常便饭。舒雅在舒州郡做官，潜山灵台观“有神仙胜迹”，任满后，请求在灵台观掌观事。他住在观里，“优游山水，吟咏自乐，时人美之”^[28]。这实际上是以观为隐。余靖奉祠居家，他自己说“颇得田园之乐，

靡思轩冕之荣”^[29]，过着田园生活。奉祠最初有一定任期，“通不得过三任”^[30]，后来竟无限期地连任下去。吕嘉问领官祠二十年^[31]，赵蕃更甚，“奉祠居家，积祠庭之考三十有三”^[32]。这样长时间住在家里，村居野处，与隐士的生活有什么两样？

官吏致仕后，很多也过着隐居生活。宋代官吏一般七十岁致仕，但相当大一部分人不到七十岁就致仕了。内臣孙可久赋性恬淡，不到五十岁就休退。他在汴京有住宅，住宅堂北有小园，城南又有别墅。“每良辰美景，以小车载酒优游自适”^[33]。杨万里先奉祠，后致仕，六十多岁退居南溪之上。“老屋一区，仅庇风雨。长须赤脚，才三四人”。^[34]徐玑赠诗给他：“清得门如水，贫唯带有金。”^[35]杨万里过的完全是清贫的隐士生活，这种生活长达十六年之久，与弃官归隐简直没有区别。像赵蕃、杨万里这些官吏，虽不能算隐士，但他们以自己长期的隐居经历，加强了隐逸的力量，扩大了隐逸的影响。

隐逸之风还使一部在职官吏也隐起来。做官而隐，古已有之，汉代东方朔就隐于金马门。不过古代还比较少。宋代在职吏隐相当普遍，这是宋代隐逸对官场辐射产生的效应。宋代仕途风波险恶，官吏饱尝宦海沉浮，迁滴流离之苦。一些官吏在官场磨去棱角，随时俯仰，避免是非，想平平安安到公卿。崔遵度淳淡清素，与世无争，口不言是非。他掌右史十多年，立朝时常常躲在大殿的柱子旁边，希望皇帝不要看见他。一般官吏总是千方百计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，讨皇帝的欢心，甚至阿谀奉承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崔遵度却避开皇帝，这不正是隐逸思想的表现么？崔遵度住居湫隘，“有小阁，手植竹数本。朝退，默坐其上，弹琴独酌，悠然自适”^[36]。他下朝过的完全是一种隐居生活。陈慥长期为地方官，张尚书举荐陈慥代他为尚书，陈慥去信婉言谢

绝,他说他“一官救饥。为生多病,资生易足。为多病,故安于慵。惟易足,故廉于取而耻于炫”。又说他“吏隐二十五年,自期老于江湖而止耳”^[37]。本来,隐和官是相对的。但居官吏隐,不求进取,陶然自乐,又与隐士在思想上完全相通。以吏为隐,确也不乏其人。在职吏隐有权,有俸,又有闲,别有一种隐逸的风味。所以连和尚惠洪也说“禄隐太平真乐事,莫思神武桂冠缨”^[38]。国子博士庞元常在嵩山建吏隐庵,想弃官而隐,请司马光赋诗。司马光阻拦他,劝他居官吏隐:

既知吏可隐,何必遗轩冕?^[39]

司马光是勤于吏职的人,他都劝人居官吏隐,可见在职吏隐在宋代非常流行。宋代很多官府都建有吏隐亭、吏隐堂、吏隐厅一类东西,这些建筑虽然带有标榜的性质,但也多少反映出在职吏隐兴盛。这种吏隐的官吏尽管没有明显的隐居行动,而主要表现在思想上,够不上称隐士,但这些官吏有权有势,大大壮大了隐逸的声威,强化了隐逸之风。

在宋代,隐逸完全成为一种时髦。人们喜欢自称隐,也喜欢称朋友是隐。建个亭子要命名为隐亭,建个园子也要命名为隐园。不管什么,士人总想把它和隐扯在一起,仿佛一沾隐,便光彩了。这就像十年浩劫中,不管谁,都自称红卫兵,自称革命派一样。又像今天,不管干什么,都要讲经济效益。这都是时代的风尚。韩侂胄在吴山筑别墅南园,南园中建有一座村庄,“竹篱茅舍,宛然田家气象”。韩侂胄来视察,看见村庄,很高兴,说:“撰得绝似,但欠鸡鸣犬吠耳”^[40]。他一出村庄,就听到鸡叫狗叫,派人去看,原来是府尹在装鸡狗叫。韩侂胄大笑,更喜爱这位府尹。园中建村庄,是隐逸之风在建筑上的反映。隐逸这样渗透进社会生活,是隐逸之风盛炽的有力证明。